

毛泽东与邓小平

郑 谦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

与

邓小平

郑谦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与邓小平/郑谦主编.—2版.—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12

ISBN 7-5438-1078-6

I.毛... II.郑... III.①毛泽东(1893~1976)
—生平事迹②邓小平(1904~1997)—生平事迹
IV.①A752②A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2073 号

责任编辑:朱永红
装帧设计:廖 铁

毛泽东与邓小平

郑 谦 主 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2003 年 12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9.25

字数:247,000 印数:1-5,000

ISBN7-5438-1078-6

C·47 定价:15.00 元

前言

近半个世纪前，中国革命的胜利震动了世界。近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和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又一次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关心中国的人们并不满足于仅仅了解这种成就在物质层面上的表现和统计数字上的反映，他们更关心的是中国取得这种成就的原因，即隐伏在物质层面变化之后并导致这种变化的理论思维和哲学智慧。

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许多学者，已经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使中国在本世纪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两位伟人——毛泽东与邓小平，希望从他们各自的思想、理论和实践，以及他们之间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中，更加准确、深刻地把握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内在规律。

本书便是这种努力之一。由于种种原因，本书所涉及的领域还不全，一些研究还刚刚涉足。我们只是想以此为开端，把这一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本书各章执笔人是：李捷（第一章）；郑谦（第二章、第七章）；陈雪薇（第三章）；林蕴晖（第四章、第十章）；朱亚宗（第五章）；柴中国（第六章）；陈述（第八章）；陆水明（第九章）。全书由郑谦统改、定稿。

目 录

前言/1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龚育之/1

- 两位伟人：毛泽东与邓小平/1
- 两代中央领导集体/6
- 两次伟大的革命/10
- 两次历史性飞跃/12
- 两大理论成果/13

一 两代巨人与两次飞跃/18

- 向必然王国进军
“以苏为鉴”/正视矛盾/独立自主，自闯新路/
- 拨乱反正的艰难历程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绕不过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与姓“社”姓“资”/改革是第二次革命/
- 两代巨人与两次飞跃
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第二次探索——惊涛骇浪的航程/站在巨人肩上的邓小平/

二 从人的解放到人的现代化/48

- 人的解放——一个古老而年轻的梦
- 荆棘满途的探索之路

- “包产到户”——迷宫中闪烁不停的星火
- 新人将伴随新世纪一起出发

三 强国梦与富国路/67

- 落后与挨打
- 睡狮的百年梦
- 球籍！球籍！
- 世纪末的最后一搏

四 只争朝夕与抓住时机/117

- 速度与球籍
超英赶美与开除球籍/巨人胆识/
- 初衷与偏误
“向科学进军”——雄壮的远征/狂热，以革命的名义/欲速则不达/
- 挑战与机遇
重新思定社会主义/抓住时机上台阶/
- 新论与新路
历史的定论/邓小平宏论/路，在脚下延伸/

五 推动第一生产力的两双巨手/149

- 科技进步——新时代的号角
- 给第一生产力正名
- 邓小平与李政道谈科技
- 毛泽东：理论物理学家的知己

六 树人大业 立国之本/167

- “有力武器”说的历史进步性与局限
- 事关全局战略的中国教育
- 教育——第一生产力之母
- 成败的关键是人才
- 坚持三个面向，培养跨世纪新人

七 突破误区/196

- 马克思的预言与斯大林的现实
- 面对黄炎培的忧虑，毛泽东胸有成竹
- 从“三反”到“文革”，毛泽东壮志未酬
-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体制问题

八 哲人睿思/218

- 苏共 20 大与风潮迭起的东欧
- 穿透迷雾的思想闪电
- “两类矛盾”说——双刃利剑
- 《论总纲》——昏暗中的一线光明
- “取消四大”与“不搞运动”
- “先富”与“后富”，一对新矛盾

九 国门，在惊涛中打开/236

- 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说：欢迎美国来中国投资
- 硝烟未散，黄华密访司徒雷登
- “一要和平，二要通商”震动了欧洲
- 全方位开放，不只对西方
- 潮头涌动的南方
- 中顾委会上一席谈
- “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
- 开放——巨人的接力
- 地球村——开放的世界
- 百年不变的基本国策

十 同是纵横大手笔，泼墨极绘风云图/258

- “一边倒”与“一条线”
突破美苏两极格局/司徒雷登回国与毛泽东的“一边倒”/
北京：1972——历史性的握手/美、中、苏，大三角/
- “不结盟”，“不当头”

“和平与发展”：多极世界的高昂变奏/

“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

● 重安全，谋发展

边界摩擦与毛泽东的忧虑/痛失发展良机：“早打、大打、

打核战争”的代价/“只有发展，才有安全”/

序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 龚育之 ·

在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的时候，记者就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伟人之间思想理论上的关系问题采访了龚育之。

两位伟人：毛泽东与邓小平

记者：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缅怀毛泽东的伟绩的时候，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问题又成为大家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龚育之：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应该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视角来认识。20 世纪，中华民族在争取解放和振兴的伟大斗争中，产生了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现在，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

本点”的基本路线，正集中力量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来说，那么就有两代伟人：毛泽东、邓小平。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现代史和我们党史可以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毛泽东领唱的，下篇是邓小平领唱的？

龚育之：上、下两篇之间发生了一个历史悲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受到批判并得到纠正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要求我们必须看清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绝不意味着应该或者可以全盘否定毛泽东。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也就全盘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现在国外有些人就是整个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国内也不是没有这种思潮的影响。有些人不仅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也否定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不仅否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否定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在一个座谈会上听到一位年轻人说，中国搞现代化，最有希望的时候是慈禧太后、袁世凯那个时候，坏就坏在辛亥革命把中国搞乱了。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

记者：看来，您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视角指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位伟人，不是没有所指的。

龚育之：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至今很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他把自己也摆在了这“一代人”之中。

记者：毛泽东夸邓小平“人才难得”，评价也很高。我听说，毛泽东还曾更具体地夸小平同志办事公道、稳当，看问题有眼光。有没有这回事？

龚育之：有。毛泽东的这个评价是在他推荐小平同志担任总书记时说的。在讨论党的八大的组织人事安排时，毛泽东提议设总书记并推荐小平同志担任这一职务。1956年9月13日，在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对这个安排作了说明。小平同志表示，他还是比较安于原来担任的秘书长职务。毛泽东接着说，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自己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接着就夸了邓小平同志的那些优点。

记者：很有必要宣传宣传毛泽东对邓小平同志的这个“宣传”。

龚育之：毛泽东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又说，他说他不行，我看行。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

记者：毛泽东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过不少肯定的评价，但得到他这样高的评价的大概不多。那么，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身上，您认为有哪些共同点？

龚育之：对这两位伟人作一番比较研究，我看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这不是几句话能讲得清楚的。讲共同点，我认为，强调“实事求是”是两人最大的共同点。

小平同志讲毛泽东思想，讲得最多的就是实事求是。他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自己说，我就是实事求是派。他在南方谈话中又强调：“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就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有人不大赞成这个提法，认为毛泽东的著作好几本，讲了那么多政治理论、军事理论、文化思想……怎么可以只讲“实事求是”四个字呢？其实，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有那么多适合中国情

况的创造，根源就在于他能够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而不是照搬本本和外国。小平同志强调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要我们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新的情况，自己去创造新的理论。

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渊源，当然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他们当年得出了许多具体结论，从那时到现在，经过了一百几十年，情况的变化是很大的。1989年5月，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强调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还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我们今天也不能躺在前人的书本上，而要以前人的科学理论为指导，面对新的实际去进行新的创造。如果后人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只限在前人的具体结论的框子里，就会束缚住自己的头脑和手脚。还是当年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时讲的，不要照搬具体结论，而要掌握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这个方法面对中国实际，解决新问题。前人的科学成果要学习，要研究。归根结底，要拿到今天的客观实际中去运用，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所以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关于社会主义的具体结论，有的是前苏联提供的模式，有的是毛泽东后期的一些设想。小平同志不因袭这些，而是抓住实事求是的精神，把所有过去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具体结论，重新拿到实践、拿到时代发展中去检验，这样他才能有创新，才能有突破思想樊笼的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从而开创出这十几年中国社会

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记者：这个共同点太重要了。请谈谈其他的共同点。

龚育之：邓小平和毛泽东，作为战略家，也有很多的共同点。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毛泽东战略思想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到农村去建立革命的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开辟这样一条道路，是非常艰难的，首先就难在它是一条新路，不是传统的路，不是俄国革命已经走过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到农村去，似乎脱离了工人阶级，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恰恰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农村找到了突破口，开辟了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农民结成同盟以发展自己的力量道路。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农村和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始终占有中心地位。今天邓小平领导中国的改革，从战略上讲，从选择改革的突破口来讲，也是首先把目光放到农村。中国的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农村是否稳定，生活是否改善，关系中国大局。某种意义上，农民的改革要求也最迫切，中国农村的经济关系也比较简单，改革起来不像城市那么复杂。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着手，取得了成功。先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突破和推广，然后又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可以说，80年代解决温饱问题，吃的是农村改革这碗饭，市场经济的酝酿和发展，也是由农村改革启动的。

我看，在中国革命战略和中国改革战略中，抓住农村和农民这一点，就抓住了中国特色。不理解中国国情的人，不能理解这个战略基点。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国的国情有透彻的了解，他们和占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农村有血肉联系，因此知道农民问题在中国的地位，知道怎样把握住这个基点去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记者：还有什么共同点？

龚育之：再比如，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时深刻阐明过的。他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患革命急性病，急于实现全国革命高潮，看不到中国

这么大个国家，革命在不同时期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不同地区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这个不平衡源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小平同志又提出了中国建设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同时期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增长速度在不同年份的不平衡，就属于这个方面；另一个是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放从沿海逐步向内地推进，就属于这个方面。从战略思想上讲，这就是把握中国发展的不平衡，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地理环境等等的平衡，从这个基点出发，在不平衡发展的基础上寻找最有效的发展方式，通过不平衡发展带动共同发展，求得将来相对的平衡发展。如果过早设想拉平，不仅本来可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上不去，全国的发展也给拖住了。像这样重大战略的把握，毛泽东和邓小平有很多相通的共同的地方。

记者：希望使中国尽快一点富强起来，也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共同点。

龚育之：这也是孙中山同他们的共同点。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这个共同点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

两代中央领导集体

记者：在我印象中，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提法，好像是小平同志概括出来的。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有的人认为需要做些解释。

龚育之：这是就那代中央领导的成熟性而言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先后有过几届中央领导。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前几届中央领导虽然取得过开拓性的重大成果，其历史意义不可磨灭。但是，在革命理论上和革命实践斗争中都还没有成熟。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毛

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我们党在总结过去成功和挫折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成熟起来，革命事业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逐步深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革命的胜利和理论的成熟，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赢得崇高威望。这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达数十年之久。社会主义新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是这代中央领导集体历史功绩的伟大丰碑。

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也是就其成熟性而言的，因为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期间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是不成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十多年来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性，证明了它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

记者：请您谈谈这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吧！

龚育之：从理论和实践来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要讲三条，即纠正、继承和发展。只讲一条不行，只讲两条也不行，必须讲三条。

记者：讲继承和发展，听起来似乎比较习惯些，把纠正也当作一条，而且排在第一条，恐怕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得了！

龚育之：继承和发展这两条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基本的方面。但从历史转折的契机来说，第一条当然是纠正，纠正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错误。这里有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我国人民遭到那么大的伤害，党和国家陷入困境和危险。从“文革”的错误中走出来，是进入新时期的前提。粉碎“四人帮”，开始了历史的转折。但是，最初两年，历史转折的进程遇到了困难。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勇气、魄力和本领正视毛泽东

晚年的错误，处理好既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凡是”，出现“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缺乏扭转和把握历史舵轮的魄力和本领。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魄力和本领就显示出来了。

1983年《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出版的时候，我给《人民日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其中写道：“在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领导能力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经过“文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还在坚持“两个凡是”的情况下，小平同志毅然站出来说：“两个凡是”不合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且是重大错误。这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大的政治勇气。在纠正这种错误的时候，出现了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小平同志又站出来，“力排众议”（“力排众议”这个词我没有写进文章中去），要求全党必须旗帜鲜明地肯定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成果，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就是讲继承。讲继承这一条同讲纠正这一条必须结合起来，才能讲得清楚。所谓“力排众议”这个“众”当然不是“大众”，不是广大人民群众，也不是党员的大多数。党内的大多数和人民的大多数是赞成小平同志这种主张的，这种主张并不孤立。但是，也的确是“众”，是“小众”，因为当时确实有相当一些人不赞成，或不很赞成、不全赞成，并不只是个别人的无足轻重的意见。所以要“力排”。“力排”这样的“众议”，也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大的政治勇气。这两个方面的政治勇气是在巨大的历史转折的环境中显示出来的。由于小平同志在这两个方面的政治勇气，我们党在这样巨大的历史转折中转得比较顺当，比较平稳，比较健康。没有第一条，就无所谓历史转折，或许还是在原路上徘徊，没有第二条，转折就可能转不好，转成混乱，那些完全离开革命轨道的东西就会泛

滥起来。这两方面又都面对势头相当强的潮流，都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需要有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掌握住历史的舵轮。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我们的确感觉到了掌舵是什么意思。

记者：这就是伟人的魅力，寻常人做不到的。

龚育之：而且还要说出道理。魅力、威信、加上道理，道理就是理论。小平同志处在有影响的地位，又有这样的魄力和魅力，又讲出了一番道理，同全党一起讨论，集中全党智慧，不仅破除了“两个凡是”的禁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且对毛泽东思想加以科学的解释，对历史是非作出科学的判断，对今后的道路作出科学的规划。这就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历史背景。

总之，小平同志敢于明确地指出和坚决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且强调只有纠正这些错误才能真正举起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旗帜。当然，讲错误，什么时候讲到什么程度，这要看情况。一开始讲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片言只语不代表毛泽东思想；后来才讲“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根本上是错误的，这就不只是片言只语的问题了。这里既有认识的过程，也有引导的艺术。新时期从纠正“文革”的错误开始，从“拨乱”开始。小平同志给“拨乱反正”下的定义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记者：经您这一分析，我对小平同志的这段话的理解又加深了一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龚育之：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是要完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未竟之业，包括改正其错误。

“反正”就是继承。拨乱，纠正错误，绝不是全盘推翻过去，绝不能否定已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东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小平同志就提出我们党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四项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为科学原理